

二 十 一 世 纪

中国文学大系

E R S H I Y I S H I J I
Z H O N G G U O W E N X U E D A X I

2001—2010

总主编 何言宏

报告文学卷1

本卷主编 丁晓原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二 十 一 世 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1—2010

总主编 何言宏

报告文学卷1

本卷主编 丁晓原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 报告文学
卷. 1/丁晓原主编.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651-1659-9

I. ①二… II. ①丁…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②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②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3024 号

书 名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报告文学卷 1
本卷主编	丁晓原
责任编辑	张 莉 王欲祥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6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	37
字 数	534 千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1659-9
定 价	75.0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顾 问

丁 帆 陈思和 林建法 洪子诚

总主编

何言宏

总策划

何言宏

策 划

丁亚芳 王政红 王欲祥

编委会成员

丁亚芳	丁晓原	王 尧	王光东	王政红
王家新	王彬彬	王欲祥	吕效平	何言宏
张学昕	张清华	张新颖	陈晓明	施战军
徐 蕾	黄发有	彭志斌		

(以姓氏笔画为序)

前言

何言宏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凡十三卷十八册，经过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终于面世，无疑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文学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表现于它的世界性的历史处境。2001年发生于美国的“9·11事件”对于世界格局的改变，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还是在精神、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都非常巨大。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经过艰苦的努力与谈判，终于加入了“WTO”。这一事件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的影响自不待言，其对我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实际上也非常深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发生和发展于这样的世界背景，并且和这样的背景发生着或显或隐的内在联系。

在中国内部，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对于世界体系的进一步融入和改革开放在多方面的拓展与深化，市场化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初步形成，媒介文化特别是网络文化的不断发展与发达，文学体制包容性的扩大和评奖制度的调整，以及中国台湾开始于上世纪末的政治转型，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对祖国的回归，都不仅使中国各个区域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生了变化，它们之间的文学与文化关系，也与此前大为不同。这些“变化”和这些“不同”，二十一世纪以来表现得尤为迅猛、尤为突出，文学处身其中，无论是主动被动，还是直接与间接，自然与它们深切关联。在这些关联中，我们关注最多和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的文学——具体地说，就是我们的作家、诗人，我们的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者，和我们的文学翻译家、文学编辑与文学出版工作者等等——都力图以他们的劳作去书写、把握、追问、反思与介入我们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广大民众的精神与生存，在我们的文学中得到了异常丰富的

表现。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潮流迭起、异彩纷呈,老一辈作家坚守良知,佳作不断;中年作家们勇猛精进,成就卓绝,殊为我们文学时代的中流砥柱;青年一代,也都姿态各异,身手非凡。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出现了那么多非常杰出的作品。我们的文学在精神特征、话语表达,在价值、美学和艺术策略上既有坚持,又有新变,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和相对独特的文学时代。这个时代虽仍在进行,但我们理由相信,它的未来必定宏阔,必有大成。因此,为了全面、系统和较为及时地总结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文学,对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基本格局和重要史料进行认真切实的梳理,并且遴选出其中的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一方面为后人对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进一步研究和文学史编撰提供最具权威性的经典文献,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套权威性、系统性和集成性的大型选本,我们特邀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著名学者和著名批评家编选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

我们的“大系”,充分借鉴和学习了赵家璧先生1935—1936年间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来各辑“大系”的历史经验,也据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既有常规性的“理论批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杂文”、“报告文学”和“史料”诸卷,也专门设立了“翻译文学”和“随笔”卷,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强调和突出“翻译文学”对于汉语文学的重要意义,也反映了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笔”文体的持续兴盛。我们希望,我们的“大系”在学术精神上既能对前辈有所承传,也能具有新的尝试和新的开辟。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虽然较早地动议于2009年,并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启动,纳入了江苏省“十二五”期间的重点出版规划,也获得了我们学术前辈的热情鼓励与肯定,但是,为了保证编选工作的客观性与严肃性,为了这项浩大的“学术工程”所必须具有的时间的沉淀,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

国文学结束几年后方始推出。各卷主编作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与文学批评界都极活跃与非常著名的学者与批评家，工作繁忙，而能戮力同心地沉潜数年，共襄盛举，真的应该深深感谢。昔者赵家璧先生在其《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前言”中曾经说过：“我们相信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间许多英雄们打平天下的伟绩，是值得有这样一部书，替他们留一个纪念的。现在我们做成了，我们觉得了却了一件心愿！”对于我们这套“大系”来说，值得纪念的，除了我们的很多作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们的文学“伟绩”，还有我们的前辈与我们的同仁们对“大系”所付出的很多热情、很多心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也非常想说：“现在我们做成了，我们觉得了却了一件心愿！”我们希望，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必将取得新的“伟绩”，我们的文学研究界与批评界，也必将有一次新的集结。

出版说明

本套《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自2010年开始策划，至今已四年有余。从组稿到选编，从定稿到编辑，几经斟酌、打磨，这套丛书终于面世了。

作为丛书的策划与出版者，我们的心中并不觉得轻松。众所周知，选编新文学大系的做法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赵家璧先生，其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又陆续出了二、三、四、五辑。新世纪以来，虽然也不断有各类文学选本陆续推出，但以头十年为考察时间段的综合性大系类丛书，这还是第一套。十年，还不足以呈现文学思潮发展的清晰脉络，但经过十年的淘洗沉淀，新世纪文学创作的趋势和特点已经逐渐在我们面前展开，渐见分明。选编本套大系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踵武前贤而又不失新世纪文学发展的特点。经过与总主编及各卷主编多次的商讨，在借鉴前五辑大系框架结构的基础上，我们选定了十三个种类，分别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翻译文学、报告文学、诗歌、散文、随笔、杂文、戏剧、理论、史料、批评，并为各卷配上了分卷主编所撰写的导言，对相关文学体裁这十年来的发展踪迹做了较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以供读者参考。

与前五辑相比，本套丛书既沿袭了传统的文学分类又有所创新，如将散文、随笔和杂文分册选编，显示了“随笔”这一文体近年来独具特色的面貌；又如将翻译文学独立成卷，凸显“翻译”这一特殊创作形式对于中国本土文学的影响，与中国文学逐步融入世界文学的步调也是相应的。当然，限于精力和客观条件，我们舍弃了一些同样具有鲜明文学特色的体裁，如小小说、儿童文学、影视文学等。

大系是一种特殊的读本，也是一种特殊的史料集，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以存真、求善为原则，订立了以下编校原则：

一、关于选目

突出名作名家，兼顾风格流派。

二、关于版本

1. 原则上以最初发表的版本为准。
2. 少量的以作者认可的定本为准。

三、关于编排顺序

全套丛书多依文章发表的先后为序，少数按照分卷主编选编的类型排序，如戏剧卷以主题分类、诗歌卷以作者姓氏排序。

四、关于注释

1. 全书不加注释，只在每篇篇末注明选文出处或版别，如原载《×××》×年第×期，或选自××出版社×年第×版。
2. 原书少量典实确实有误，也不改动，但加脚注予以指出。

五、关于编校

所选篇目文字以初版为据；少量以作者定稿本为据的，加注说明。

1. 错别字径改。但异形字或异形词，或者过去的习惯用法如其它一其他、精炼一精练等，原文如用前一项的均不改。
2. 标点依据目前较规范的法，对明显的错用加以改动，但不强求统一。
3. 年代、数字、称谓的用法也一依原作，不作统一。

文学大系的选编既是一家之见，难免会存在争议。但我们相信，争议也正是编辑这套丛书的意义之一。由于经验和水平，我们的编校中难免还存在失误和错谬，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使我们的工作更臻完善。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7月23日

导言

丁晓原

历史以自己本有的步履行进着。迎接二十一世纪到来的种种情景还如在目前，它却已经走过第一个十年。世纪之新，是否就意味着存在之新，现在要对此作一整体性的回答，可能是困难的。至少新世纪十年的若干存在，它更多的是一个时间的范畴。就文学而言，“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在我看来其意义主要是技术性的。这一命名便于我们对这一时段的文学有一个可以操作的具体对象。社会以一种业已启动的巨大力量运行，新世纪文学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只是我们乘着新世纪的快车，在进入到新世纪路段时，应该会有新的风景映入眼帘。

新世纪十年是文学进一步边缘化的时期。在文学内部则是以小说为中心文体，报告文学和散文等就是边缘的边缘了。报告文学以非虚构而文学的独特性自成一体。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曾经并不被看好，甚至评论界还有报告文学文体“枯竭”、“消亡”、“尴尬”之说。^① 现在的实际证明，报告文学未曾“枯竭”、“消亡”或是“尴尬”，相反它以自己的姿势描画出新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应有位置。我不赞成片面化的文学断语，如同报告文学文体“枯竭”、“消亡”、“尴尬”论一样，说现在是文学的非虚构

① 李敬泽：《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吴俊：《也说“报告文学”身份的尴尬》，《文汇报》2004年1月18日；黄浩、黄凡中：《报告文学：文体的时代尴尬——对报告文学“生存艰难”的本体质疑》，《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

时代也是不真实之见。新的世纪是文学更加纷呈多态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社会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动的时期,现实生活的无限丰富性、复杂性,为报告文学提供了不竭的写作资源。这是一个需要报告文学有为而且也是报告文学能够有为的时期。最近,报告文学评论家王晖用“裂变与复兴”评说新世纪报告文学:“可以说,裂变与复兴,既是报告文学当下状态的真实写照,也是其赖以生存的转型时期政治社会生态特性的深刻反映。”^①所谓“裂变”是指报告文学呈现“多元态势”,而“复兴”是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相比较所呈现的一种趋势。这大致是符合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实际的。

王晖的“复兴”之说涉及了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报告文学发展的盘整期,相对于八十年代它明显的冷寂了,虽然此间也有《沂蒙九章》(李存葆)、《昆山之路》(杨守松)、《以人民的名义》(卢跃刚)、《落泪是金》(何建明)、《马家军调查》(赵瑜)、《“希望工程”纪实》(黄传会)、《没有家园的灵魂》(杨黎光)、《淮河的警告》(陈桂棣)、《走出地球村》(李鸣生)、《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张建伟)、《远东朝鲜战争》(王树增)等影响广泛的优秀作品,但无论是文体创作的整体规模、表达深度,还是文体发展的历史推进意义等,都不可以和八十年代比拟。到了新的世纪,报告文学开始走出它的盘整期,进入到新的活跃期。但这种活跃是不同于新时期的“轰动”的。我们观照新世纪报告文学,无法淡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一巨幅的背景。言及报告文学,我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怀念那一特殊的年代。事实上,八十年代是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时代,报告文学成为当时文学大潮中的主潮,很多读者和研究者,正是在那时才认知这一独特文体的。但由此界内与界外形成了一种情结,往往将1980年代作为观察评估报告文学的基本标尺,以此衡量这一文体的后续创作。这一般来说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问题是这样的定式就有可能忽视文体存在的具体的历史语境,影响到对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准确评价。这就需要我

^① 王晖:《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的裂变与复兴》,《光明日报》2010年8月26日。

们认真观照并且把握特殊时期报告文学的基本生态。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就是“轰动”，轰动不仅在文坛，而且广及社会，报告文学写作与传播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轰动”是社会情绪化的一种直观，它源于报告文学与时代启蒙主题的谐振。其时，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主流承载着社会思想启蒙的责任。作为“中心”的文学与社会政治在一定层面上具有某种同构性，尤其是意识形态写作色彩浓郁的报告文学更是这样。而在新世纪，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刻推进，思想启蒙让位于经济中心，物质崇拜成为社会趋重的价值尺度。作为精神生产重要方式的文学，也被日益的边缘化。这一时期有“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的强烈设问，可见从一定程度而言，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担当被搁置。而报告文学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场域中，难以理想化地达成。对于现实的深入介入和对于报告对象的深刻反思等报告文学文体重要的精神品格，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弱化了。但文学的边缘化，是常态社会的正常图景，它有可能生成适宜文学自由发展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新世纪的十年是多元纷呈的十年，当然也是良莠不齐的时期。就报告文学而言，一方面有去知识分子写作的倾向；另一方面依然有作家坚守既有的文体写作理想，将报告文学设置成一种特殊的“社会预警”方式。一方面报告文学作家充分认知文体反映现实的独特功能，以报告文学记录新的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进程和这一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等；另一方面作家又注意拓展报告文学的题材空间，写作大量具有史志意味的作品。一方面报告文学作家顺延这一文体的写作范式，以新闻、文学和政论建构文本；另一方面又努力于文体的新变，在新闻性渐次、主体性表达退位中，重构非虚构叙事本身对于受众的召唤力。简而言之，新世纪报告文学对于意识形态写作的淡化，对于启蒙写作主题预设模式的分化，使其在题旨价值、话语空间和叙事形式等诸多方面显示出相当充分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新世纪文学边缘化时代报告文学创作的活力和张力。多维多态的“复调”与“复式”，成为新世纪报告文学文体重要的特质。

二

题旨价值的“复调”——“启蒙唯一性”的放弃与启蒙品格的坚守。

我们说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写作的知识分子特性有所弱化,这是基于这一时期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比较而得出的判断。报告文学的知识分子写作,既关乎写作主体自我的角色定位,也与时代社会给予这一特殊文体的可能性相连。总体上,新世纪的社会存在没有可能使报告文学实现如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的整体的批判性、启蒙性。在新世纪社会非启蒙的总体规约影响下,报告文学作家自觉、不自觉或可能是无奈地放弃了报告文学“启蒙唯一性”的坚持。无疑,批判性、反思性、启蒙性是报告文学文体的历史传统,也是这一文体基本的功能,报告文学写作仍然必须坚守这样的品格。但是应该说,报告文学除了启蒙、批判、反思等重要的价值外,它更常态化的功能是“报告”,是基于理性精神的文学“非虚构”。这样,批判性是报告文学评价的重要尺度而不是唯一的尺度。正是由于在新的社会文化生态中,报告文学作家对文体有了更为开放客观全面的认知,所以在作品的主题设置上有了更多的选择。

一个时代有其特殊的时代主题规定。新世纪十年社会主导性的思潮是非启蒙的。启蒙大体意指对于存在的质疑、反思,由此表示对人类公共价值的守持,对社会理想的追寻。它指向人的精神建构。所谓“非启蒙”,是基于社会发展阶段性目标而设计的以物质利益为务的价值准则。经济 GDP 崇拜强势地制导着社会及其成员的行为,人们普遍地关注自身生存的物质配置以及在物化社会中所具有的“身价”,无暇或不愿作为一个思想着的主体思考人类应有的精神取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能启动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但在二十一世纪开始这十年中,似乎连这样的动议都没有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世纪“非启蒙”的特点。社会的这种情势必然影响到报告文学作家的价值追求。因此一般而言,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思想性写作是比较缺失的,以对象的呈现代替主体的思考成为一种通常的方式。并不是所有揭示现实矛盾、人性丑陋等的作品就一定具有思想的品格和精神的

高度，如果把握不当，这类作品就只是世相或问题的铺陈展览。欲望写作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一个话题类型，但反映腐败的作品多数停留于浅层的叙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成为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热点题材，发表出版的地震非虚构作品数量甚多，但真正具有思想分量的作品很少。作家的“非启蒙”取向也体现在报告文学的表达上。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激情抒写明显不同的是，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更多的是中和叙事。表现在具有知识分子特性的报告文学写作类型中，可以分出显性的知识分子写作和隐性的知识分子写作。显性的知识分子写作如《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天使在作战》（朱晓军）、《集体离婚》（曹筠武）、《胡风案中人与事》（李洁非）等，题材极具前沿性和尖锐性，但作者采用的是较为客观叙事的方式，在语言类型上节制使用激扬文字的政论语言，克制主体对于对象的直接评说，尽可能让事实本身说话。《胡风案中人与事》是与知识分子关联的题目，内涵具有难以尽言的社会历史与个人命运的悲怆性，但作者对此的处理却是少露声色的，以“白描式”的叙写，讲述普通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莫名的却是宿命的故事。这与启蒙时代这一类型的报告文学写作的主观化有着明显的不同。隐性的知识分子写作如《震中在人心》（李鸣生）。这部作品取材于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大地震的写作有很多可能性，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评奖中就有五部（篇）作品入围备选篇目，最终《震中在人心》脱颖而出，并且名列获奖作品第一。《震中在人心》显示了隐性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意义。这是一部具有“复调”主题的长篇摄影报告文学，它“用镜头定格真相，让文字留下思考”，作品不仅有通常的抗震救灾感人场面，而且也有对人类遭致重大创伤的生命之痛，还有对于地震灾害作出的深刻反思。作品不仅观照地震的视角独异，而且在情感与思考的深度上超越了同类作品。《震中在人心》不经意阅读咀嚼不到它特别的价值，但进入其间，感染随生，像“守望红领巾的狗”、“废墟上的儿童节”这样的文字，给读者造成的震撼挥之不去。

题材的日常生活化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趋向。其深层的原因也与对“启蒙唯一性”报告文学写作伦理的放弃有关。题材的日常生活化

的标志物是《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曾经发表过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人民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报告文学发展的贡献率远不如《当代》、《中国作家》和《北京文学》等。大约是考虑到作为国家文学重要品牌应该在某些方面发挥它应有的引领作用，《人民文学》从2010年第2期起推出《非虚构》栏目。“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但是，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限，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主编李敬泽例说的“非虚构”，就是“写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还有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所写的那种非虚构小说，还有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感情的社会调查，大概都是‘非虚构’”。^①“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②《人民文学》还举办“非虚构：新的文学可能性”研讨会，启动名为“人民大地”的非虚构写作计划。这里所说的“非虚构”显然是一个包含了报告文学在内，但比报告文学内涵更多、外延更大的文类概念。其实，《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并非是一个新的文学命名，它源于美国的非虚构文学，新新闻报道(New Journalism)，“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界对此已有介绍。《人民文学》“非虚构”的意义不在于命名，因为探讨“非虚构”与报告文学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异同并无多少实际的意义。在我看来，《人民文学》对于“非虚构”所作倡导，其重要价值在于赋予了“非虚构”更多新的诠释和中国价值。它在现时对“非虚构”的标举，或许能推动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非虚构写作。《人民文学》推出的“非虚构”代表作，为这一类写作提供了新的写作伦理和新的表达

① 《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主编留言。

② 《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内容简介。

可能。这首先是此类写作应当是经由个体生命体验的写作。现场感和个人性是“非虚构”写作的两个重要关键词。只有亲验，才能有真正的非虚构，才能呈现真实的生活现场，才能溢出滋味情意，才能生成我们所期待的文学的非虚构。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是他打工时生活的写真。“打工”、“电子厂”、“流水拉”、“制衣厂”、“五金厂”、“加班”、“打卡”、“集体宿舍”、“出租屋”、“爱情”等，构成了“南方工业生活”的基本词汇，由此白描出一类人群的基本人生样态。其次，这类“非虚构”写作，现实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某种“原生态”的面目进入作品。这不仅拓殖了文体叙写的空间，而且也形成了作品新的表达风致。“非虚构”在表达上由启蒙叙事的“激扬文字”转型为生活叙事的客观言说。梁鸿的《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名为《中国在梁庄》）在《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中是最耐读的作品。中原梁庄是作者生长于斯的故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存在的一个标本。梁鸿设置了“静默叙事”，讲述乡村景象和百姓的生活故事，表现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内地农村的现实危机，其间流溢着一种深深的涩味。《梁庄》的“祛政论教训”式的叙事，是对原有报告文学写作范式的一种有意义的改变。这样的一种方式为读者以自己的感知去解读作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其实，“非启蒙性”只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一种显性取向。这并不表示这一时期报告文学作家全体地放弃他们的社会职志和责任担当，无视社会的问题存在，迁就物化欲望对于人的腐蚀，满足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作一味的讴歌。检视新世纪初十年的报告文学，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作家依然坚守着报告文学文体的基本精神，在现实生活的前沿进行独立的观察、思考并写作反思性的报告。作为知识分子写作方式的报告文学，有一现成的链接就是“问题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对于“问题”的介入、观照和思考等与知识分子关注社会、质疑批判不合理存在、追求价值公理等精神具有内在的关联。因此，“问题报告文学”往往成为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一种顺手的方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潮”，报告文学成为其时文学的主潮之一，重要的原因是《人妖之间》（刘宾雁）、《中国的“小皇

帝”》(涵逸)、《神圣忧思路》(苏晓康)、《世界大串联》(胡平、张胜友)、《国殇》(霍达)、《伐木者,醒来!》(徐刚)等“问题报告文学”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力。显然,新世纪的“问题报告文学”的规模小了,其影响也大不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但它部分地承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问题报告文学”的基本精神,并且在问题的题材选择以及题旨表达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特色。在享乐主义盛行的年代,报告文学作家在“繁华”背面看到了“问题”,兼具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问题意识”。《中国农民调查》、《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魏荣汉、董江爱)、《天使在作战》、《集体离婚》、《我的课桌在哪里》(黄传会)、《老年悲歌》(曲兰)、《矿难如麻》(长江)、《王家岭的诉说》(赵瑜等)、《红与黑》(一合)、《中国式拆迁》(阮梅、吴素梅)等,这些作品提取的问题涉及广泛,有的题材题旨严肃重大,具有很强的反思意识、批判力度和悲悯情怀。

发表于2003年第6期《当代》的《中国农民调查》是新世纪“问题报告文学”中的重要作品,尽管作品可能存在以局部而概说整体等的不足,但作者陈桂棣、春桃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历时三年采写安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的长篇报告,至少在题材的选取和问题呈示的重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引起广泛反响也主要在此,作品于2006年获得国际报告文学尤利西斯奖一等奖。对于心灵物化的批判(如《集体离婚》等)和对于弱势人群的关注(如《我的课桌在哪里》等),是新世纪“问题报告文学”中最有新世纪特质的部分,“欲望书写”和“底层叙事”,生成了新世纪“问题报告文学”重要的叙写类型。《集体离婚》这一短篇所揭示的问题发人深省。为了获取开发区建设征地补偿政策设计漏洞中可能的利益,成百上千的人上演“集体离婚”的活剧。在这里,开发区实际上成为一个现代物化的意象,婚姻这样人生的大事演化为儿戏。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个利益。《集体离婚》提供的是一个极端化的样本,它给出了物质时代人们精神沙化的严肃话题。《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矿难如麻》、《红与黑》等作品尽管所写内容不同,但都指向欲望对于人性乃至生命的破坏。投入巨资参与村官选举,其驱动力来自投资后利益回报的预